

从动结式的产生过程看句法生成机制的演化^{*}

杨大然

程 工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动结式从上古汉语的并列连动式发展而来,但先前研究提出的双音化趋势和核心偏移说均未能较好解释这一变化的动因及内在机制。通过核心偏移形成的两类动结式与强弱结果结构的比较,本文提出,核心左偏动结式形成弱结果结构,其中涉及底层核心动词到轻动词的“并入”,而核心右偏动结式形成强结果结构,其生成中不仅涉及“并入”,还涉及表达方式的动词词根($\sqrt{V_1}$)与 v 通过“融合”操作形成复杂谓词。本研究表明,“融合”相较于“并入”是晚出的句法生成手段,其运用不仅实现了从双核心连动式向单核心动结式的演变,也很可能促成了汉语其他句式结构的形成,并从更广泛意义上推动了汉语从动词框架语向卫星框架语的类型转化。

关键词 动结式 连动式 核心偏移 并入 融合

DOI:10.13724/j.cnki.ctiw.2024.01.010

一 引言

在汉语的演化历史中,动结式(亦称述补式)的产生与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形成标志着上古汉语单动词使动用法的衰落,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目前的主流看法是动结式从上古汉语的并列连动式演变而来,但对于动结式的具体产生年代仍存在不少争议,由此形成了先秦说、汉代说、六朝说和唐代说等不同见解(见梁银峰,2006:17—24的梳理),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连动式的 V_2 何时从他动词变为自动词。然而,单纯依赖连动式 V_2 的句法性质变化来判定动结式的产生年代并不可靠(姚振武,2013),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动结式的形成机制。本文主要探讨从并列连动式到动结式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偏移及其相应的句法机制,并从中管窥句法系统生成机制的演化。本研究认为,从连动式到动结式发展过程的关键一环在于“融合”是晚于“并入”出现的新型句法操作手段,该操作是在表达丰富性和精细化的语义要求下运算系统对句法生成机制进行调整的结果,它很可能促成了汉语其他句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从更广泛意义上推动了汉语从动词框架语向卫星框架语的类型转化。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物语言学视域下汉语宏事件编码的形态句法研究”(20BYY163)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二 关于动结式产生动因的既有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动结式的产生与古汉语使动用法的衰落密切相关,但从大量语料来看,后者并非前者的直接来源。多数学者支持动结式由上古汉语的连动式发展而来的观点(吴福祥,1999;赵长才,2000;冯胜利,2002;帅志嵩,2014;石村广,2016等)。赵长才(2000)提出,上古汉语连动式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广义连动的早期形式是 V_1 和 V_2 各自带宾语,两者的宾语往往具有相同指称,逐渐通过“而”来连接,形成广义连动的后期形式“ V_1 而 V_2 O”。随着双动共宾结构的大量出现,该形式逐步为不带“而”的狭义连动式取代,而后 V_2 从及物动词(或他动词)转变为不及物动词(或自动词),最终形成动结式(表示为 VRO)。这一演化过程如下表所示:

表 1 连动式到动结式的发展历程

	结构形式	例句
一	广义连动式 I(V_1 O+ V_2 O)	楚之虔诱蔡侯般,杀之于中。(《春秋经·昭公十一年》)
二	广义连动式 II(V_1 而 V_2 O)	至射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七年》)
三	狭义连动式(V_1 V_2 O)	至射杀官者。(《史记·晋世家》)
四	动结式(VRO)	主人欲打死之。(《太平广记》卷第九十一)

从形式上看,狭义连动式与动结式非常相近,二者属于同形异构(石村广,2016:341),前者应是后者的直接来源。两者的差别在于狭义连动式的 V_2 仍具有使动用法,与 V_1 的地位平等,而动结式的 V_2 (即补语 R) 已从致使他动用法演变为自动用法,与 V_1 形成动补关系。多数学者的看法是,判定一个连动式是否已演变为动结式,关键看 V_2 是否仍保留使动用法。蒋绍愚(1999:330)指出,“只有断定这些自动词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构成述宾关系,才能肯定是动结式。”

如果动结式是由上古汉语连动式演变而来,那么原本各自独立且地位平等的 V_1 和 V_2 缘何能凝固为一个复合动词? 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动结式产生的原动力是汉代以后兴起的双音节化趋势,即 V_1 与 V_2 的结合是双音节化驱动的结果(志村良治,1984;石毓智,2002;董秀芳,2011;石村广,2016)。石村广(2016)提出,动结式的产生本质上是古代使动用法从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的历时演变结果,即历史上消失的单音节使动词经过双音化变成了动结式,后者弥补前者消失后在表达体系上的空缺。

应该说,双音化过程的确是汉语历时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广义连动式的后期形式(V_1 而 V_2 O)到狭义连动式(V_1 V_2 O)的演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即由“射而杀之”到“射杀官者”应是双音化驱动的结果。然而,该过程不足以解释动结式的整体演化脉络。动结式的直接来源是狭义连动式 V_1 V_2 ,这是动结式产生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双音化趋势显然对这一演化过程缺乏解释力,因为从音节角度讲,狭义连动式中 V_1 与 V_2 的邻接实际上已满足双音化要求,它与动结式在音节和韵律上并无本质区别,两者的本质差别应在于 V_2 的他动词用法与 R 的自动词用法的不同。从这个角度讲,双音化趋势并非动结式产生的直接动因。

上古汉语连动式是双核心并列结构,而动结式是单核心复合词,从连动式到动结式的演变过程不仅涉及音节的调整,也涉及句法核心的变化。一些学者提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涉及

经“重新分析”后句法核心的偏移(魏培泉,2000;赵长才,2000等)。这些研究认识到动结式的产生伴随着句法核心的转移,但共性问题是对“重新分析”缺乏明确界定,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重新分析”,“重新分析”后形成怎样的句法构造?

冯胜利(2002)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连动式的不稳定性和两解性是引发核心偏移的动因,最终导致双核连动式发展为单核动结式。冯胜利提出,连动式的核心偏移有两种可能方式:一是“义素兼并”导致的核心左偏,其发生条件是 V_2 的义素蕴涵于 V_1 之中,以“绞杀”为例,其义素组合如下:

(1)绞=[使死亡+用绳索勒或吊]

杀=[使死亡+以某种方式或手段]

“绞”的语义更为具体,既说明致死方式,也说明最终的死亡结果,其中蕴含了“杀”的义素,类似例子还包括“椎杀、刺杀、射杀、斩杀、诛杀”等。冯胜利认为,在历时发展中,“杀”的义素逐渐被前面含“使死亡”义的 V_1 所兼并而丧失核心地位,形成核心左偏。其句法结构变化如(2)所示:

(2)核心左偏



第二种是“语义类差”形成的核心右偏,此情况中 V_2 与 V_1 的义素彼此独立, V_2 是语义重心所在。以“围杀”为例,其整体蕴涵“致死”的结果义,但“围”只表达致死方式,不涉及“死亡”的结果状态。当大量类似结构(如“矫杀、篡杀、蛰杀、幽杀”等)出现后,它们因致使方式(即 V_1)的不同构成语义类差集, V_1 逐渐丧失核心地位成为 V_2 的修饰语,形成核心右偏(见(3))。

(3)核心右偏



冯胜利提出,核心左偏和核心右偏经“重新分析”分别形成两种结构体,前者形成[动+补]的动结式,后者形成[状+动]的偏正式(如“怒斥”)。

应该说,核心双向偏移的看法能够较客观地反映“一脉二流”的发展脉络,也得到了语言事实的有力证明,但该分析存在两点问题。首先,无论是核心左偏还是右偏的结构体,虽然都标明了核心与非核心,但只是出于语义上的判定。从句法构造上讲,所形成的核心偏移结构与原初的连动式(即左侧图示)并无本质区别,即 V_1 与 V_2 的组合方式和层级构造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句法系统无法有效识别出核心成分。换言之,语义核心的偏移理应带来句法构造的变化,若仍维持原来连动式的合并方式,势必造成语义表达和句法构造的不匹配。

其次,冯胜利认为动结式只来源于“义素兼并”引发的核心左偏,这一看法较为片面。按此观点,动结式的 V_1 应既蕴涵动作方式,也蕴涵 V_2 表达的结果状态。但就现代汉语而言,

大多数动结式的方式义与结果义相互分离,即述语 V_1 只表示动作方式,结果义由补语 V_2 单独表达(杨大然,2018:10),两者在语义上存在互补,这也符合 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10)提出的“方式/结果互补限制”(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另一方面,冯胜利(2002:11)认为核心右偏的条件是一个集合义类的单个成员之间存在“语义类差”。事实上,这一语义条件不仅适用于[状+中]类偏正结构,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的动结式。例如,如果以“破”作为表结果状态的 V_2 ,那么选择不同的活动方式(即不同的 V_1),就可以形成一个集合义类,如{摔破、抠破、捅破、踢破、咬破、踩破……},其中的每个成员都与其他成员形成语义类差,该集合符合语义类差导致的核心右偏条件,那么上古汉语的双核心连动式经过核心右偏形成的不只是状动式复合词,也可能是动结式复合词。综上,连动式经核心左偏形成的动结式在现代汉语中实际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大多数的动结式应属于 V_1 与 V_2 彼此独立的核心右偏型动结式。

三 两类结果性结构及其句法生成机制

冯胜利(2002)采用句法说的初衷旨在说明双核心连动式通过怎样的机制发展为单核心动结式,并解释为什么这种运作以前没有发生。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两个问题未得到很好解答。本节我们从两类结果性结构的不同生成方式入手,探讨动结式产生过程中所涉及的句法生成手段的变化。

文献中,汉语动结式的普遍译法是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意为“结果性复合动词”。可以看出,学界从广义上倾向于将动结结构归入汉语的结果性结构(resultative construction)。Washio(1997:7)基于跨语言的证据,将自然语言中由谓词和结果补语形成的结果性结构从总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强结果结构(strong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该类型的基本特征是谓词义素中不包含补语的义素,即两者的词汇语义彼此独立。以(4b)为例,drag 在词典中的释义为 to pull (sth. heavy) along with great effort,其中不包含与结果补语 smooth 有关的义素。其他两句亦是如此。按照 Washio 的定义,(4)中的例句都应归入英语强结果结构。

- (4)a. 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b. The horses dragged the logs smooth.
c. The jockeys raced the horses sweaty.

与强结果结构相对的是弱结果结构。Washio(1997:7)指出,弱结果结构中谓词和补语的义素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存在一定的蕴涵关系,即谓词的义素中包含某种结果倾向,补语指称的状态蕴涵于这一结果倾向之中。来看(5)和(6)所示的英语和日语例句。(5)中 clean 和 kirei 指称的结果状态(即“干净”)实际上蕴含于 wipe 和 hui(“擦”)表达的结果倾向中。在(6)中,paint 和 nut(刷)的义素其中虽不直接蕴涵“变蓝”这一结果状态,但“刷”的动作必然会造成墙上某种色彩的形成,补语 blue 和 buruu(蓝色)指称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或者说是对其结果的具体说明。因此,(5)和(6)都属于弱结果结构。

- (5)a.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kare-wa teeburu-o kirei-ni hui-ta
他-话题 桌子-宾格 干净 擦-过去时

‘他擦干净了桌子。’

(6)a. John painted the wall blue.

b. John-ga kabe-o buruu-ni nut-ta. (日语)

约翰-主格 墙-宾格 蓝色 刷-过去时

‘约翰刷蓝了墙。’

除了语义特征上的不同, Washio(1997:8)还观察到两类结构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强结果结构允许出现所谓“假宾语”(fake object), 即宾语不是谓词论元结构内的应选论元。如(7)所示, 当结果补语 thin 被拿掉后, 两句均不能成立, 这一方面说明主动词与宾语之间不存在论元选择关系, 另一方面也说明主动词义素中一定不包含 thin 所表达的结果状态。相反, 弱结果结构的谓词不允许带“假宾语”。以(5a)为例, 若去掉结果补语 clean, 句子依然成立, 说明 the table 作为 wipe 的应有论元, 是真正的宾语。若将 the table 换成类似(7)中的“假宾语”, 句子则不合法, 如(8b)所示^①。从这一对比得出, 谓词能否带“假宾语”可作为鉴别强弱结果结构的一种句法手段。

(7)a. The joggers ran the pavement *(thin).

b. The planes flew the ozone layer *(thin). (引自 Washio, 1997:8)

(8)a.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He wiped the pavement clean.

Washio 指出, 强弱结果结构的划分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 几乎所有语言中都有弱结果结构, 而强结果结构只存在于部分语言之中。例如, 对应(4a)的句子在日语和意大利语中都不合法, 如:

(9)a. ??John-ga kinzoku-o petyanko-ni tatai-ta. (日语)

约翰-主格 金属-宾格 平-ni 砸-过去时

b. *Gianni ha martellato il metallo piatto. (意大利语)

詹尼 助动词 砸 定冠词(阳性) 金属(阳性) 平(阳性)

据此, Washio(1997:8)依据是否允准强结果结构将自然语言分为两类: 一类只允许弱结果结构, 以日语和意大利语等为代表; 另一类允许强弱两种结果性结构, 以英语和德语等日耳曼语为代表。在 Washio(1997)的基础上, Mateu(2012)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强弱结果结构的区分不仅体现于谓词与补语的语义蕴涵关系, 深层次上还涉及句法生成机制上的差异。具体来讲, 对于弱结果结构, 由于其中补语的结果状态蕴含于谓词, Mateu 假设两者的词根先形成一个复合成分, 整体充当表达状态变化的功能语类 P(ath)的补足语^②。在推导中, 谓词的词根√HUI 先上移到 P, 而后再上移到表致使的轻动词 V, 而补语的词根始终处

① (7a)表达 The joggers 发出“跑”的动作, 造成的结果是 the pavement 变成 thin 的状态, 其结构可以用 Hoestra(1988)的小句分析法来分析, 即[the pavement thin]作为小句充当 ran 的补足语。但该分析不适用于(8)的弱结果结构, 因为按照小句分析法, 主语发出了 wipe 的动作, 但该动作未直接作用于后面的 NP (即 the pavement 不是 wipe 的论元), 但结果事件是 the pavement 变成 clean 的状态, 这显然有悖于人们的常识, 因而(8b)不能成立。

② Mateu(2012)将表达状态变化和表达空间位移事件的核心功能语类都统一为 Path。

四 两类动结式的句法生成机制

将核心左偏和右偏的两类动结式与强弱两类结果性结构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语义关系上存在较为整齐的对应。冯胜利(2002)提出上古汉语连动式核心左偏的前提是满足“义素兼并条件”,即 V_2 的义素蕴涵于 V_1 之中,这一语义关系恰好与弱结果结构相符,后者也要求补语的义素蕴涵于谓词的义素之中。如(14)所示,“干净”和“干”表达的结果状态分别蕴涵于“擦”和“烘”,即 V_2 是 V_1 可预期的自然结果,此类核心左偏的动结式形成的是弱结果结构。相反,连动式发生核心右偏的条件是 V_2 与 V_1 的义素彼此独立,这又刚好与强结果结构的语义特征吻合,后者要求补语与谓词的义素不存在蕴涵关系。如(15a—b)所示,“唱”和“吃”的动作中不包含“哭”和“穷”表达的结果状态,或者说后者不是前者的预期结果, V 和 R 的义素相互独立,此类核心右偏的动结式形成强结果结构。由于强结果结构的 V_1 未对 V_2 施加语义限制,与 V_1 预期结果相反的形容词也可以充当 V_2 ,如在特定语境下还存在与“擦干净”和“烘干”相对的临时组合“擦脏”和“烘湿”,如(15c—d)所示,这也证明现代汉语中确实有强弱结果结构之分^③。

(14)核心左偏动结式(弱结果结构)

- a. 萍萍就抬起手来擦干净了眼泪。(余华《我为什么要结婚》)
- b. 她的衣服是像已经烘干了一部分。(曹禺《雷雨》)

(15)核心右偏动结式(强结果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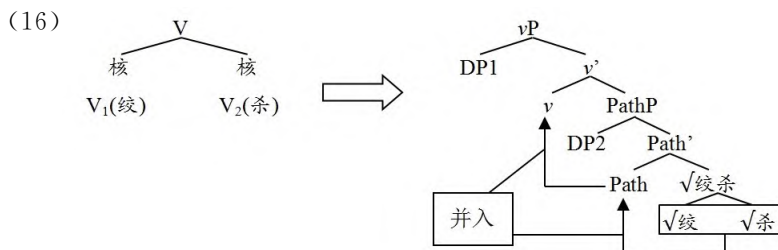
- a. 这首歌曾唱哭了千万人。(2000年《人民日报》)
- b. 干部人数过多,吃穷了财政。(1993年《人民日报》)
- c. 字面擦脏了,罚抄整页纸。(王朔《看上去很美》)
- d. 结了冰的衣服拿去烘会烘湿,冰一化,衣服就全湿了。

核心偏移的两类动结式分属强弱结果结构的另一个证据是两者在是否允许“假宾语”上存在差异。对于例(14),由于 V_2 的义素蕴涵于 V_1 之中,宾语若要达到 V_2 表达的结果状态,必须成为 V_1 的直接作用对象,即动结式宾语应是 V_1 的直接宾语,因而此类核心左偏动结式不允许出现“假宾语”(fake object),应归属于弱结果结构。相反,核心右偏的动结式允许“假宾语”的出现,如(15a—b)所示,其中“千万人”不是“唱”直接作用的对象,“财政”也不是“吃”的应有论元。这两句的合法性证明动结式宾语的结果状态与 V_1 表达的动作无关,这进一步说明 V_1 与 V_2 之间不存在义素上的蕴涵关系,因此将核心右偏动结式与强结果结构相对应是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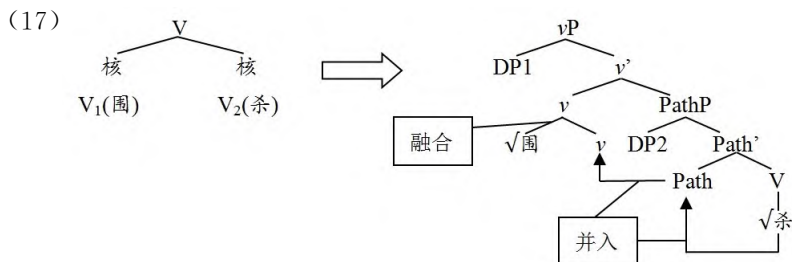
基于强弱结果结构在句法生成上的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核心左偏和核心右偏的动结式尽管都来源于上古汉语连动式,但在演变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句法生成机制,最终形成的句法构造也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对于核心左偏动结式,以“绞杀”为例,按照弱结果结构的

③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动结式是一个庞杂类别,其内部组成成分的黏着性、词汇意义、凝固程度都有一定差别。本文主要关注一些较为典型的动结式,一些相对较为特殊的动结式,如 V_2 意义虚化的“相位动结式”(phase resultative)(Li & Thompson 1981)(如“吃完”“做好”)和 V_2 为二价动词的动结式(如“吃腻”“听烦”等)暂不在考察范围内。

生成分析(如(11)),在核心偏移之前,同为核心的“绞”和“杀”作为词根处于同一节点之下,由于后者的语义蕴含于前者之中,核心发生偏移后,词根“√杀”首先与处于同一节点下的词根“√绞”合并,两者形成一个词根复合体“√绞杀”,而后该复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相继上移到表达状态变化义的 Path 和表达致使义的 *v*,分别与这两个功能性中心语发生“并入”,最终填补 *v* 的语音内容。其结构派生如(16)所示^④:



对于核心右偏动结式,其与英语的强结果结构(VOR)不完全一致。在英语中,尽管 V 与 R 的义素彼此独立,但谓词始终是 V, R 只能是非谓词成分(形容词或副词),表达 V 义素之外的一种结果状态, V 与 R 的语义无主次之分。与之不同的是,核心右偏动结式的 V_2 应是整个谓词的语义重心,至于其是否是决定论元实现(或配价)的句法核心,学界的看法不一。李临定(1984)和马希文(1987)等主张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核心统一于 V_2 ,而沈家煊(2003)和宋文辉(2004)等则主张核心分离,即句法核心在 V_1 ,语义核心在 V_2 。杨大然(2018)对这两种观点均予以反驳,提出动结式的核心应是功能性轻动词,而不是词汇性成分 V_1 或 V_2 。本研究赞同杨大然(2018)的“功能核心说”,我们认为,对于核心右偏动结式,其句法核心是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的轻动词 *v*,其决定动结结构的论元选择,而它的具体语义内容由“并入”该位置的 V_2 来填充,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此类动结式的核心右偏性质。结合前面(13)的句法构造以及杨大然(2018)的结构分析,我们提出从双核心连动式到核心右偏动结式经历了如下的结构变化(以“围杀”为例)。



上面结构中,词根“√杀”先上移至中心语 Path 与其发生“并入”,而后继续“并入”到上上层中

④ 需要说明的是,例(16)中词根复合体“√绞杀”移位至 Path,与 Path 表达状态变化的语义并不矛盾,原因在于弱结果结构的特点是 V_2 的语义蕴含于 V_1 之中,也就是说 V_1 不仅表达方式,也蕴含一定的结果义,因此 Path 一定程度上与 V_1 也存在语义联系。当然,现代汉语中 V_1 兼具方式和结果义的动词数量并不多,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弱结果结构的数量应远少于强结果结构,这也与事实相符,大量临时组成的动结式都属于强结果结构(如“擦脏”“烘湿”“看歪”等),它们的形成实际上是晚出的“融合”操作为动结式带来更强能产性的结果。

心语 v ，在填补轻动词 v 语音内容的同时，也成为句子的语义核心。而在整个致使性句法结构形成后，“ $\sqrt{\text{围}}$ ”作为活动方式类词根通过与致使轻动词 v 的“融合”进入句法推导，这一点与(13)所示的强结果结构保持一致。

上述结构分析可以较好解决冯胜利(2002)留下的一些问题。从(16)(17)可以看到，从连动式到动结式的演变不只是在核心标识上的简单变化(见(2)(3))，而是双核心的连动式随着语义重心的变化，通过不同的句法手段，即“并入”和“融合”，分别形成具有不同结构形式的单核心复合词。从这一演化过程来看，动结式的形成并非词库内某些特殊的词汇规则使然，而是与连动式一样，仍依靠句法规则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动结式实际上是一种句法词(morphological word)，而不是词汇词(lexical word)，它与连动式都是句法操作的产物。在下节中，我们将进一步阐明，动结式的演化路径不仅深刻反映了汉语在语言类型上的历时演变，也可能揭示了人类语言在句法生成机制上的演化规律。

五 从动结式的形成发展管窥句法生成机制的演化

余健萍(1957)曾提出，从单动式到动结式的演化路径为“ $B \rightarrow A$ 而 $B \rightarrow AB$ (如：破之 $\rightarrow$ 撞而破之 $\rightarrow$ 撞破)”，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王力，1989；赵长才，2000；石村广，2016等)，对此本文也予以认同。下面我们依据该路径来考察汉语在句法生成机制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5.1 “融合”晚于“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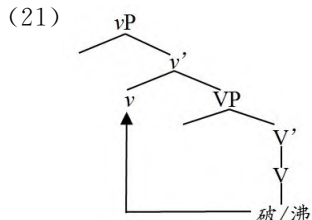
从史料来看，汉语单语素动词的使动用法历史悠久，产生年代可追溯到甲骨文时期。如(18)所示，其中的“来人”“宁风”均为使动，意为“使人来”和“使风停止”。

- (18)a. 贞：师般其来人？(合集 1036) b. 癸卯卜，宾贞：宁风？(合集 13372)

一些学者认为，此类使动结构与不及物的非宾格结构存在派生关系。Hu(2018:138)指出，上古汉语中表达状态变化的非宾格动词可自由转换为及物性致使动词，如：

- (19)a. 燕攻打齐，齐破。(《战国策·齐六》)
 b. 与谋伐齐，竟破齐，闵王出走。(《战国策·燕一》)
 (20)a. 昔者，洪水沸出。(《汉书·司马相如传》)
 b. 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周礼·夏官司马》)

Hu(2018)认为，上面 b 句的致使用法是从 a 句的非宾格用法派生而来，即基础生成于下层 VP 中心语的动词通过移位占据上层表致使义的轻动词 v ，其生成过程应如(2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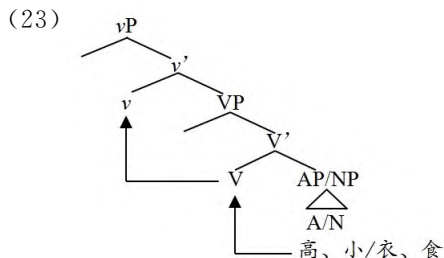
到了西周时期，类似的使动用法拓展到由形容词、名词以及方位词等做谓词的结构，如(22)所示。Huang(2015:28)提出，这些转化而来的使动用法也可通过类似(21)的中心语移位来分析，稍有不同的是，这些形容词或名词初始生成于 V 的补足语位置，而后相继上移至

表活动义的V和表致使义的v,最终转化为致使动词,其结构如(23)所示。

(22)a. 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荀子·儒效》)

b. 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礼记·表记》)

c.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小雅·信南山》)



从(23)可见,无论是动词本身的使动用法,还是形容词、名词等派生而来的致使动词,其生成过程都涉及底层的词汇中心语向上层的功能中心语的移位。按照Haugen(2009:257)和Basciano(2010:113—114)等的分析,这样的中心语移位应归入典型的“并入”操作。

按照前文的分析,动结式是由狭义连动式直接发展而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连动式语义核心偏移方式的不同,运算系统采用不同的句法机制孕育出两种类型的动结式。对于第一类核心左偏动结式,句法系统仍运用原有的“并入”手段,即占据底层的中心语V的核心动词(V_1)通过“并入”与上层致使性中心语v结合,形成如(16)所示的弱结果结构。对于第二类核心右偏动结式,运算系统在维持原有“并入”手段的同时,即核心动词 V_2 移到上层的中心语v,也运用了词根与轻动词的“融合”手段,其中 V_1 作为表达方式的动词词根与v发生了直接合并,形成如(17)所示的强结果结构。从词的使动用法到并列连动式再到动结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判定,“融合”应是晚于“并入”出现的一种新的句法生成手段,正是该手段的运用为动结式的产生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使得不稳定的连动式双核心结构以不同方式形成两种类型的单核心动结结构。

前文提到,冯胜利(2002)提出关于动结式演变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连动式通过怎样的句法手段才能成为动结式,二是为什么这种运作之前没有发生。前面的分析基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即这一演变过程为何之前没有发生。如果说“融合”操作的运用是动结式形成的关键,那么该问题可归结为“融合”操作产生的动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语义表达上的要求是该操作得以启用的主要动因。与动结式相比,词的使动用法虽然在形式上更为简洁,但在表达上存在一定缺陷。使动用法的动词一般为单语素,宾语往往比较短小,形式单一,二者构成的致使结构只表达结果,未能表达造成该结果的行为方式,从而造成致使事件中的关键性语义要素,如方式、原因等信息的缺失,无法满足表义的丰富性。王力(1989:262)指出,“使动用法只能表示使某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这一结果”。随着汉语由综合性向分析性过渡,动词概念化的信息逐渐趋于简单,表结果状态和表行为方式的动词分工越来越明确(蒋绍愚,2005:233;Huang,2015)。因此,语义表达的丰富性和精细化要求推动了“方式动词+结果动词”这一复合结构的产生,即实现了从使动式“小之”到动结式“斫小它”的过渡,后者因表义更为明确而在两者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并最终取代前者。“融合”操作的出现正是在语义表达丰富性和精细化的驱动下,运算系统

在句法生成机制上所做出的相应调整,即在原有的纯合并和移位(并入)操作之外,启用了之前句法系统内未曾使用的“融合”(或直接合并)机制,使得表达动作方式或原因的非核心动词成分(V_1)得以进入句法推导,对致使方式进行具体说明,最终形成了动结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类型,即核心右偏型动结式,实现了语义表达与句法表达之间的相互匹配。

5.2 更多证据支持

从动结式的产生过程得出“融合”晚于“并入”出现的推断可以得到其他证据支持。首先,该推断与汉语历时发展中的类型转换相契合。Talmy(2000)按照运动事件核心图式(即路径)的词汇化编码模式划分了动词框架语(verb-framed languages,简称 V-语言)和卫星框架语(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简称 S-语言),前者的运动路径由主动词编码,后者的路径由附加语编码。英语是典型 S-语言,如(24a)所示,其运动路径由附加语 into 来编码,而说明动作方式的副事件编码于主动词。相反,西班牙语是典型 V-语言,其运动路径只能编码于主动词,因此与(24a)相对应的(24b)不可接受。其合法的表达只能是(25a),其中主动词 entró 编码路径,副事件由分词成分 flotando 编码。作为 S-语言的英语也允许类似(25a)的表达(如(25b)),只是该结构不是运动事件的主要表达方式。

(24)a. The bottle floated into the cave.

b. ??La botella flotó a la cueva.(西班牙语)

冠词 瓶子 漂 到 定冠词 山洞

(25)a. La botella entró a la cueva flotando.(西班牙语)

冠词 瓶子 进入 到 定冠词 山洞 漂(分词形式)

‘瓶子漂进了山洞。’

b. The bottle entered the cave by floating.

近年来,学界的诸多研究表明(Mateu,2012;Fan,2014;Acedo-Matellán,2016等),V-语言和 S-语言在运动事件编码上呈现的系统性差异可归结为两类语言在运算系统的生成机制上的差别:S-语言允许表达方式的动词词根嫁接于轻动词 v ,即与后者发生“融合”,可以形成(24a)所示的方向性运动方式结构,同时其也允许词根移位与轻动词发生“并入”,形成(25b)。相反,V-语言只允许词根通过“并入”与轻动词结合,而不允许两者发生直接合并,因此,如(24b)所示的结构在以西班牙语为代表的 V-语言中被排除。

对于汉语的词汇化类型,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汉语在历时发展过程中经历或者正在经历从 V-语言到 S-语言的类型转变(见 Peyraube,2006;Xu,2006;史文磊,2014等)。根据史文磊(2014)的考察,上古汉语的运动事件以单动式路径动词为主(占比 73.75%),现代汉语则主要通过“方式+路径”的动趋式来表达(占比 70.39%),呈现出显著的从 V-语言到 S-语言的发展趋势。此外,上古汉语的动词可兼融[运动]、[方式]和[路径]多个义素,表现出综合性词化模式(如“登”),而现代汉语中[方式]和[路径]义素则呈现互补分布倾向,这也进一步证明汉语词化类型表现出 V-语言向 S-语言过渡的倾向。

依据上述两方面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到的合理推断是,“融合”是汉语从 V-语言(古汉语)向 S-语言(现代汉语)转变过程中启用的一种新的句法生成机制,它的出现晚于“并入”以及其他更为基本的合并类型(如“纯合并”等),这恰恰与前面我们从动结式的演变轨迹中得出的推断相吻合。也就是说,“融合”手段的运用不仅推动了从双核心连动式向单核心动

结式的演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也为汉语从V-语言向S-语言的类型转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句法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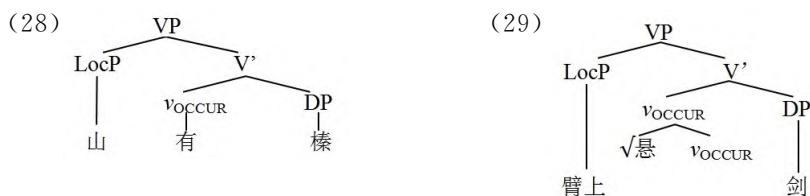
“融合”操作晚于“并入”的推断还可以从汉语存现句的历时发展中得到证实。根据储泽祥等(1997)的考察,最早出现的两类存现句是以静态义的“有”和“是”构成的“有”字句和“是”字句。宋代以前,两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存在结构,如:

- (26)a. 山有榛。(《诗经·邶风·简兮》)
 b. 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史记·苏秦列传》)
 c. 善庆思惟毕,满目是泪。(《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到了汉代,开始出现“有”“是”之外的一般动词做谓语的存现句,唐代以后此类句式趋于成熟,存现动词还可以带上体标记“着”或“了”。如:

- (27)a. 臂上悬剑。(《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文》)
 b. 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宋话本小说《错斩崔宁》)
 c. 那人家门首吊着个龟盖。(元孟汉卿《魔合罗》杂剧)

根据隋娜、王广成(2009)的研究,汉语存现句的动词具有非宾格性,反映其事件类型的核心谓词是轻动词 v_{OCCUR} ^⑤。从事件意义上讲,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字句和“是”字句表达最基本的存在义,据此本文认为,其中的静态谓词“有”或“是”应分析为事件轻动词 v_{OCCUR} 的语音实现。以(26a)为例,其结构大致如(28)所示。可以看出,早期“有”字句或“是”字句的生成中只涉及最基本的合并操作,即作为轻动词的“有”或“是”先与后面的名词合并,而后再与句首的方位名词合并。对于后来发展出的活动方式类动词构成的存现句,其不仅在表义上更加丰富,在结构上也更为复杂。汪昌松(2021)的研究认为,此类存现句的生成中涉及活动方式动词以词根形式与轻动词 v_{OCCUR} 发生“直接合并”,表达存在或促成隐现的方式,如(27a)表示“剑”以“悬”的方式存在于“臂上”,(27c)表示“龟盖”以“吊”的方式位于“门首”。从本质上讲,汪昌松(2021)提出的“直接合并”与本文所说的“融合”属于同一种操作,都涉及词根与轻动词的形态嫁接。仍以(28a)为例,其句法结构可表示为(29)。



从存现句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动结式的发展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早期的存现结构只是通过“有”或“是”来表达最基本的存在义,而没有活动方式类动词构成的存现句,其原因很可能也是上古汉语的句法生成机制中尚不存在,或者说尚未启用“融合”这一句法手段。而后在语义表达丰富性和精细化要求的驱动下,即不仅要说明某处存在某物,还要说明某物以何种方式存在或出现,语言的句法操作机制进行了相应调整,开始运用“融合”这一新型生成手段,表达活动方式的动词得以进入存现句担任谓词,表明某物存在或出现的具体方式,

⑤ 隋娜、王广成(2009:226)将该事件谓词表示为 OCCUR,本文为了与前面的结构分析保持一致,用 v_{OCCUR} 来表示该事件谓词,它属于轻动词 v 的一个子类(flavor)。

以实现语义表达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匹配。

另一方面的证据是,存现句与动结式在发展轨迹上也有较大程度的重合。依据储泽祥等(1997)的调查,方式动词做谓语的存现句始于汉代,发展成熟于唐宋时期。对于汉语动结式,尽管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存在一定争议,但先前大部分研究都认同词的使动用法的衰退始于东汉时期(见李平(1987)的统计数据),那么动结式的最初形成大致应在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志村良治,1984;蒋绍愚,1999;吴福祥,1999;赵长才,2000;梁银峰,2006等),并最终在唐代发展成熟(梅祖麟,1991)。可以看出,动结式与活动方式动词做谓语的存现句在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有着较高程度的重合。依据本文的讨论,这种并行发展的态势并非巧合,它进一步印证了两种句式的产生很可能是受制于相同的句法生成机制,即都是在语义丰富性条件的促发下运算系统运用“融合”这一新型句法生成机制的结果。

六 结语

本研究基于动结式的产生发展过程探讨了句法生成机制的更新与演化。本文提出,双音化趋势无法对这一过程做出合理解释,该过程本质上涉及核心偏移形成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条以“义素兼并”为条件的核心左移,形成“绞杀”为代表的弱结果结构;另一条是以“义素类差”为条件的核心右移,形成“围杀”为代表的强结果结构。前者的形成机制主要涉及底层核心动词到轻动词 v 的“并入”,该操作仍维系先前词的使动用法的生成机制;而后的生成中不仅包含“并入”,还涉及表达方式的动词词根($\sqrt{V_1}$)与 v 通过“融合”操作形成一个句法单位,该操作是运算系统在表义丰富性和精确性的驱动下所启用的新型句法生成机制,使得表达行为方式的句法成分(即 $\sqrt{V_1}$)得以进入推导,形成了仅靠“并入”所无法构建的强结果结构,实现了语义要求和句法表达之间的匹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更多证据进一步证明,“融合”作为一种相较于“并入”晚出的句法生成手段,不仅实现了从双核心连动式向单核心动结式的演变,也很可能促成了包括存现句在内的汉语其他句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了汉语从V-语言向S-语言的类型转化。

参考文献

- 储泽祥、刘精盛、龙国富、田辉、叶桂柳、郑贤章(1997) 汉语存在句的历时性考察,《古汉语研究》第4期。
- 董秀芳(2011)《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2002) 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1999) 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绍愚(2005)《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临定(1984) 究竟哪个“补”哪个:“动补格”关系再议,《汉语学习》第2期。
- 李平(1987)《世说新语》、《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梁银峰(2006)《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上海:学林出版社。
- 马希文(1987) 与动结式动词有关的句式,《中国语文》第5期。
- 梅祖麟(1991)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200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石村广(2016) 动结式的致使意义和使动用法的双音化,《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石毓智 (2002) 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言研究》第1期。
- 史文磊 (2014)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帅志嵩 (2014) 从事件结构看汉语动结式的衍生途径,《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宋文辉 (2004) 再论现代汉语动结式的核心,《现代外语》第2期。
- 隋娜、王广成 (2009) 汉语存现句中动词的非宾格性,《现代外语》第3期。
- 汪昌松 (2021) 句法—形态接口视域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现代外语》第3期。
- 王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魏培泉 (2000) 《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七十一本第四分册。
- 吴福祥 (1999) 试论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来源,江蓝生、侯精一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大然 (2018) 生成性建构主义视角下动结式的核心问题探究,《外国语》第2期。
- 姚振武 (2013) 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检讨,《古汉语研究》第1期。
- 余健萍 (1957)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
- 赵长才 (2000) 汉语述补结构的历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志村良治 (1984)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北京:中华书局。
- Acedo-Matellán, Victor (2016) *The morphosyntax of tran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ker, Mark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sciano, Bianca (2010) *Verbal compounding and causa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Verona.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an, Sheng-yang (2014) Argument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A lexical-syntactic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 Harley, Heidi (2005) How do verbs get their names? Denominal verbs, manner incorpora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verb roots in English. In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42–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ugen, Jason D. (2009) Hyponymous objects and late insertion, *Lingua* 119(2): 242–262.
- Hoestra, Teun (1988) Small clause results, *Lingua* 74(2–3): 101–139.
- Hu, Xuhui (2018) *Encoding events: Function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s and var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In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Wei-Tien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eu, Jaume (2012) Conflation and incorporation processes in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 Violeta Demonte and Louise McNally (eds.), *Telicity, change, and state: A Cross-categorical view of event structure*, 252–2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yraube, Alain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Maya Hickmann and Stéphane Robert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121–13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Rappaport Hovav, Malka & Beth Levin (2010) Reflections on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In Malka

- Rappaport Hovav, 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eds.)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2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ashio, Ryuichi (1997) Resultatives, compositionality and language vari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1): 1—49.
- Xu, Dan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yntactic genera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YANG Daran CHENG Gong

Abstract The current mainstream view in academia believes that the resultative verb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has evolved from the coordinat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Archaic Chinese. However, the trend of disyllablization and the head-shift analysis proposed by previous studies fail to account for the motivation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is change. By comparing the two types of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RVCs) formed by head shift and the strong and weak resultativ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VC with head shifting to V_1 is a kind of weak resultatives, which involve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omplex verb root into a light verb. The RVC with head shifting to V_2 is a kind of strong resultatives, involving not only incorporation, but also conflation of the manner root $\sqrt{V_1}$ with the light verb v .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conflation is a later emerged syntactic operation compared to incorpor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change from the coordinate verb construction to the resultative verb construction, and in a broader sense,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rom a verb-framed language to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Keywords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head shift,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corporation, conflation

作者简介

杨大然,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与英汉结构对比研究。
[Email: coolydr@163.com]

程工,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与形态学。[Email: chenggong@zju.edu.cn]